澳大利亚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认知

[澳] 罗德尼·蒂芬（Rodney Tiffen）

内容摘要：澳大利亚对中国国际行为和全球角色的看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截至1973年），澳大利亚将中国视为冷战中的敌人；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将中国视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是第三阶段，中国被视为超级大国，被期待发挥更大的全球性作用。近年，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的“亲近度”出现下降趋势，两国关系在更加紧密的同时呈现“多层面”特征。虽然从物质层面讲，在各种双边争端中权力平衡开始向中国方面倾斜，但中国对于权力的运用将受到更多批评。

关键词：澳大利亚　对华认知　间断性均衡

无论是政治人物的表态，还是媒体的看法，澳大利亚对中国国际行为和全球角色的看法已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澳大利亚将中国视为冷战中的敌人，这一阶段大致在两国于1973年建立外交关系时结束。从那时起，将中国视为一个外部侵略者的看法基本上就消失了。

第二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对中国存在多种认知，如将中国视为商业机遇、违反人权者，认为中国在文化方面具有极大吸引力。但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认知之下，澳大利亚仍将中国视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澳大利亚被视为一个超级大国。这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更高期待。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澳大利亚被视为一个超级大国。这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更高期待。一方面，对于商业机遇的重

[澳] 罗德尼·蒂芬（Rodney Tiffen）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荣休教授。

视更加突出。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被期待发挥更大的全球性作用。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仅仅是参与已经不够了，它被期待在贸易谈判、经济治理和应对失败国家人道主义危机等方面承担领导责任。

这些新的期待在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界人士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评论中得到了突出反映。从澳大利亚国内有关气候变暖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国际行为的看法。中国的国际行为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时事评论和政策思辨的恒常话题。

每一位将军都为迎接最后的那场战争做好准备。那些在获得成功的同时却引发新的难题的例子，那些可以在一时发挥作用但却难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经验，在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尽管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进化论显得并不时髦，但有理由相信，这些理论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当前充满变动性和复杂性的国际体系。特别是，“间断性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可以帮助解释政治上的需求和期待是如何变化的。在此文中，我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分为三个阶段，并集中阐述近年来与对华期待有关的那些变化。

一、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经问世，人们就努力将其应用到社会上。但大致而言，结果总是令人不快的。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这一理论所带来的有害的和误导性的观念，自那时起就使以进化论视角思考社会/政治发展变得问题丛生。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具有实证基础的社会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从一开始，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具有实证基础的社会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适者生存”——这一概念并非由达尔文发明，而是由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很快就被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所吸收，被用来证明白种人优越和欧洲国家充当殖民者的正当性。即便和种族主义无关，这种理论也被用来证明既有的各种等级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关于物种的，而非个人，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用它来解释为何在社会中某些人成功了，而另一些人却没有。

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被当成一个证明现状正当性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被当成一个证明现状正当性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或许比证明为何有些人应处于社会顶层更令人反感的是，这一理论成为反福利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被用来证明那种对贫弱者和底层挣扎者不报同情的社会政策的正当性。最极端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为了让社会整体上更加强有力，弱者自生自灭其实更好。最糟糕的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社会生活，它的拥趸鼓吹实行种族改

良计划。

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选择地、误导性地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对社会生活所抱有的看法建立在冲突和竞争，而非合作与相互促进的基础上。他们还经常以一种灾难预言式的论调看待进化的性质。实际上，物种的灭绝是很罕见的，从长期来看，整个自然大致均衡，而生物以稳定而非突变为特征。

为了展开以下论述，我们必须校正有关进化论的误导性观点。首先，从进化论角度看，合作至少和冲突一样重要。其次，进化并不是指生物体的本质属性，而是它们对环境的适应。因此，如果一个动物 / 种群更好地适应了一种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仍能更好地适应另一种环境。最后，进化论并不是目的论意义上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朝向某种理想状态的不断提升的过程。问题应该是从何进化而来，而不是往何处进化。进化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那些能够生存下来并持续下去的物种将兴旺起来，尽管按照各种不同标准，其他物种更优或者较劣。

社会 / 政治变化的活力使人们对进化论再次产生兴趣。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近年的一本著作强调了从进化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并运用复杂这一概念来探究经济学。[1] 常规经济学只是关注经济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变化。它并没有充分理解体系的动力，在这个体系中，“超过97% 的人类财富只是在过去人类历史长河中0.01% 的时间里创造的；从物质层面来说，一个生活在1750年的英国人更像是凯撒军团的一员，而不是更像他的曾孙。[2] 在拜因霍克看来，经济是一个具有高度活力、不断演进的体系，与人类的大脑、互联网或生态系统极为相似。

由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的“间断性均衡”理论[3] 是对进化论的一种发展，这个理论在社会解释方面特别有用，因为历史既包含延续性，也存在不连续性。这一概念建立在变化具有不连续性的基础上。从长期看可能存在稳定或大致均衡的状态，但也间或有快速变化的时期。“间断性均衡”理论指出，在某一点起作用和非常适应的东西在一些关键变化发生之后可能就变得不再起作用和不可持续了。

这种轴心时期的变化可能由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导致，有时伴随着危机。同样，这种关键性变化也会由体系内部的变化所导致。这一情况在经济领域最容易出现，经济领域与其说是静止和均衡，还不如说是每个公司都在寻求提升自己的产品和利润，寻求扩展新的市场。它们会发现自己或者是适合技术变革的方向，或者是不适合其发展方向。有时，某种商品或行为与人口的结合会产生极大的影

1 Eric Beinhocker, *The Origin of Wealth: Evolution, Complexity and the Radical Remaking of Economic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6.

2 Ibid., p.11.

3 Stephen Jay Gould , "Punctuated Equilibrium: A Different Way of Seeing" *New Scientist*, 94, April 15, 1982, pp.137-139.

响。一种道路系统在5%的人口拥有汽车时是吃得消的，但当30%的人口拥有汽车时就吃不消了。量变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可以带来质变。

二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国家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繁荣期，但这是一种蕴涵着新问题的成功。人们变得愈加富裕，这意味着他们去追求一种在过去会被视为太过铺张或罕见的消费习惯。因此，营养不良的问题让位于过度肥胖的问题。吸烟变得很普遍，对健康的灾难性影响随之显现。社会上的汽车拥有量上升，随之是道路通行费飞涨，接下去是出台多种政策，来降低汽车的拥有量。

"间断性均衡"理论抓住了社会进步呈现非线性的特点。

"间断性均衡"理论抓住了社会进步呈现非线性的特点。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理论并不是要证明进步不会发生，而是反对"历史的终结"。新的挑战会不断出现。

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析自1949年以来澳中关系所经历的三大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不同的认知、期待和假想。尤其是，我认为两国关系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期待已不同于第二阶段，而是变得更高。

二、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三个阶段

从1949年开始，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的第一阶段将中国视为冷战敌人。虽然在这个持续了23年的阶段中，澳大利亚对华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内容未变。主要是，将中国和苏联看成是一个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侵略基础上的、铁板一块的集团。这就意味着，与美国结成异常紧密的同盟是阻挡共产主义扩张和保证澳大利亚安全的唯一途径。

1972年，国际范围内最重大的事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但在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事件是爱德华·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1] 领导的工党赢得了选举，这是自1949年以来澳大利亚首次执政党更迭。惠特拉姆上台后最先要做的事情便包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开启了澳中关系的第二阶段。即便是三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底，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m Fraser）的保守主义政府上台，与中国的联盟关系依然得到维持。尽管冷战是弗雷泽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中苏关系分裂使澳大利亚不再将中国视为敌人。

在第二阶段，澳大利亚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对于中国的集权主义统治和人权表现继续持批评态度。但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想法还是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以及希望中国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更明显的友好态度。与前

1 惠特拉姆1916年出生于墨尔本，1945年加入澳大利亚工党，是二战后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被称为"中澳建交之父"。1972年，在当时的执政联盟连续主政澳大利亚23年之后，惠特拉姆终于率领工党取得了组阁权。——译注

一阶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中国文化、中国的成就和发展前景以及中国带来的经济机遇给予了更全面的积极评价。[1]

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已不再令人有什么疑问，但一个关键的新进展是，中国不再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超级大国。虽然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事件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但基本上这一变化是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

正如“间断性均衡”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新阶段，一些原来运用的假定已经不够用了。如今，因为运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中国国内和国际行为缺陷的认知正在被放大。

如今，因为运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中国国内和国际行为缺陷的认知正在被放大。

三、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趋势

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反映了两国关系持续变化的性质。在第一阶段，大多数民众认为澳大利亚安全受到了外部威胁，而认为威胁来自中国的人最多。[2] 这种威胁感在1966年达到了顶峰，“受越战影响的选举”（Vietnam election）也在那一年举行。到了1972年，随着澳大利亚执政党更迭，民众对越南战争的认识更为清醒，这种威胁感出现了明显的消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威胁感从各方面来说都变得更轻了，即便美苏之间仍存在高度紧张关系。很多年来，民意调查机构罗伊·摩根研究公司（Roy Morgan Research）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在您看来，澳大利亚安全是否受到某些国家的威胁？如果是，那么是哪些国家呢？”最近一次提出这一问题是在2009年，3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什么威胁，6%选择说不清。最常被提及的三个可能威胁澳大利亚安全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20%）、伊朗（12%）和阿富汗（10%）。中国以8%名列第四，其他五个国家以6%或7%排在中国之后。中国的排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差不多一直在这个位置，这表明对中国是澳大利亚直接威胁的感觉已降至“不相关区间”（对威胁的认知不只是与安全相关，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比例在一个月内从7%升至16%，这表

1 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Asian Relations, Australia-Asia Papers, No. 41, 1987.

2 Murray Goot, "Red, White and Brown: Australian Attitudes to the World since the Thirties" *Australian Outlook*, Vol. 24, No. 2, 1970, pp.188-200.

明了威胁认知的敏感性）。[1] 与“澳大利亚选举研究”[2] 有关的类似调查显示，大部分民众并不认为中国会成为澳大利亚的安全威胁。2004年，持这一看法的民众比例达到历史上最高点61%，2007年稍降至54%。[3]

然而，洛伊研究所（the Lowy Institute）等机构所做的更加深入的民意调查表明，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在趋冷。[4] 一方面，7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澳有利（在两年中上升了10个百分点），认为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非常重要（两国关系新阶段的特征之一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给予更大的关注，对澳大利亚四份有影响的报纸进行检索统计显示，1990年有133篇文章涉及中国，2000年是774篇，但仅在2010年上半年，涉华文章就超过1600篇。[5]）。但另一方面，这两年对中国在澳投资的看法变得更加消极。如果我们将认为澳大利亚容许的中国投资过多的民众和认为数量正好或过少的民众相比较，2009年，这一比例是50:45，但到了2010年就变为57:37。这两年，认为中国欲控制亚洲的民众比例从60%升至69%。一项量度澳民众对相关国家认知“亲近度”的调查表明，从2007年至2009年，澳大利亚人对中国认知的“亲近度”下降，这一指数从61降至54。

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些认知变化的可靠性。在某些方面，民意会受近期新闻报道的很大影响。比如，2009年，有一系列争议性事件发生——力拓和中国铝业公司之间的争端，中国逮捕胡士泰和其他力拓（中国）高管，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流亡领袖”访问澳大利亚的反应。然而，澳大利亚人对华看法朝积极方面发展的那种变化似乎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倒退。

因为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双边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多层面的特征，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争端很可能会更多，而非更少。

四、当前的争议

因为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双边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多层面的特征，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争端很可能会更多，

1 Possum Comitatus, “Public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s Security Threats,” *Pollytics*, August 26, 2009. http://blogs.crikey.com.au/pollytics/2009/08/26/security-threats/.

2 澳大利选举研究（Australian Electoral Studie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译注

3 Ian McAllister and Juliet Clark, *Trends in Australian Political Opinion: Results from the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1987-2007*, Canberra: Australian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 2008, p.36.

4 Fergus Hanson,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Lowy Institute Poll 2010; Andrew *Shearer Sweet and Sour: Australia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August 2010; The 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 *China's Neighbou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Washington DC, Pew, 2006.

5 Shearer op cit p.5.

而非更少。但这些争端也不太可能严重到足以威胁两国总体关系的地步。关键问题是，虽然外部世界对一个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发展中国家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外界在评价一个超级大国时却会采取不同的标准。因此，当前中国的各项政策，比如对缅甸、朝鲜和伊朗的政策，要比以往受到更多的批评。

吊诡的是，这意味着，虽然从物质层面讲，在各种双边争端中权力平衡已经开始向中国方面倾斜，但对于权力的运用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批评。虽然一种狭隘的现实主义视角会认为中国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但笔者倒认为中国的活动空间反而变小了，因为威胁使用权力已是相当敏感的事情了。当国际问题需要一种一致方式来解决时，超级大国就会被期待扮演中心角色，以承担起让体系发挥作用的责任。

虽然从物质层面讲，在各种双边争端中权力平衡已经开始向中国方面倾斜，但对于权力的运用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批评。

（一）安全问题

近来，澳大利亚的一流安全问题专家休·怀特（Hugh White）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澳大利亚对自身未来的愿景存在问题，也就是认为中国的快速但具有不确定的发展虽对澳大利亚有利，但澳应期待美国在该地区保持首强地位。[1]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辩论。

最大的争议在于，怀特对澳大利亚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所提出的政策建议。[2] 我必须承认，我对于这篇文章以及继而发生的辩论的基本看法是，“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有违现实，现实主义者的假定并不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方式。民族国家在这篇文章中看上去像是台球，这种看法总是有问题的和简单化的。国家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比以往具有更多层次，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中比以往小得多的部分。国际关系中，不仅有交织得比之前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也变得多重和多元，因此现实主义者的看法显得更具误导性。

因此，把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网想得过为简单，并认为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质上就是获取权力，这些看法实际上曲解了国家的现实选择和认知（比如，怀特教授把美国和中国经济繁荣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说成是一种“经济恐怖平衡”，[3] 这一说法很奇怪）。

现实主义思想对当代国际形势的重大曲解之一是，过分夸大了军事力量的重

---

1 Hugh White,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No. 39, Melbourne: Black Inc., 2010.

2 或许最强的反对声音来自《澳大利亚人》报国际问题主编Greg Sheridan, 他称该文“的确很奇怪”，是他所见过的由那些有官方背景的人所撰写的“最愚蠢的战略文件”，“Distorted Vision of Future US-China Relations,” *The Australian*, September 11, 2010.

3 *Op cit*, p.32.

要性。正如怀特所言，“自从中国在1979年‘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以来，东亚的主要国家之间就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军事行动”。[1] 除去中东和非洲，大规模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间争端[2] 已逐渐变得不可想象，[3] 因为使用武力会让一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付出代价，即便是成功使用武力，代价也是高得不容考虑。但是，怀特的关切大部分与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军力有关。

他的部分观点所涉及的实证内容是难以成立的。比如，“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将继续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过去40年中，“中国和日本就接受美国领导地位达成了某种交易”；中国“不愿接受自1972年实现（中美）和解以来一直没有更多影响力的状况，它甘冒打乱秩序之风险”；“‘亚洲协调’（Concert of Asia）给中国民众所带来的好处要比他们所期望的少得多”。[4] 这些观点缺乏证据，跟那些自我证明式的主张差不多，而且也很难讲清楚这些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从总体上去思考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的非现实性在怀特的另一观点中也有所体现：“美国将不得不放弃它对中国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那些仍然残留的质疑，并在批评中国内部事务时变得更加谨慎。这意味着不再就持政治异见者、西藏或宗教自由问题教训中国。”[5] 不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决定怎么做，随着公民社会跨国联系的增强，对上述那些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将持续下去。此外，现实主义思想的逻辑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越强，它按照自己意愿进行行动的自由度就越大。而在我看来，一旦一个国家被视为超级大国而非发展中国家，对它的关注和监督就会更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在不被他国挑战的情况下采取自由行动的范围会更小。

一旦一个国家被视为超级大国而非发展中国家，对它的关注和监督就会更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在不被他国挑战的情况下采取自由行动的范围会更小。

（二）全球变暖

进化不仅与生物的特征有关，还与它们如何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有关。我们记得一个理论，说的是恐龙的消亡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大脑较小，而是因为当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整个地球的气候和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此，当环境的变化使过去的生存方式不可持续时，生物的变化也就出现了。目前，整个世界所

1 Op cit, p.3.

2 这不包括内战。当然还有一些受到国际授权的军事干预，比如澳大利亚和联合国部队1999年在东帝汶的行动。

3 See Hugh White, "Why War in Asia Remains Thinkable," *Survival*, Vol. 50,No. 6, pp. 85-104; Richard A. Bitzinger and Barry Desker, "Why East Asian War is Unlikely," *Survival*, Vol.50,No. 6, pp.105-128.

4 White, op cit, p.33; p.5; p.24; p.24.

5 White op cit p.37-38.

面临的环境变化就是气候变暖。另一个变化就是不同物质的相对稀缺造成的价格变动，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中石油价格可能会上升。

在近代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事件像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那样被人们寄予如此之多的希望。就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这次会议是全球峰会所具有的诸多糟糕特征的一个缩影：不切实际的期望，在程序问题上耍花招导致积极情绪消却，以及会议的失败被那些各怀盘算的人用来实现自己国内的政治目的。

在澳大利亚，有两股非常对立的派别，但这两派都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环保主义者对会议没有得到一个更强硬、更有约束力的成果而感到失望。而反对工党政府的保守派则称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令人鄙视的失败，他们决意从政治上去羞辱工党政府。

回头想一想，这次会议并不是像当时所说的那样失败。但是在澳大利亚，这种将会议视为全然失败的看法却产生了非常实实在在的政治后果。这有很多原因，包括对会议举办过程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这次会议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胜利，并表明一旦要付出代价时，很多国家都不会认真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不过，对于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和媒体来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国家为峰会失败负责不可，那么，中国便是第一号被告。回过头来看，这种指责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峰会上的行事风格，而不仅是因为它的政策立场，毕竟四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最终还是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尤其是，中国的策略好像是要么接受要么放弃，它并没有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

对于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和媒体来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国家为峰会失败负责不可，那么，中国便是第一号被告。

近来，有关中国减排努力的报道一直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出现。但这些报道都不像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表现所带来的后果那么有影响力。但是，那些持建设性态度参与这一辩论的澳大利亚人都承认，中国正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莱昂·盖特勒（Leon Gettler）甚至称，“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似乎只有中国才能发挥领导作用”。[1] 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力的环境问题记者亚当·莫顿（Adam Morton）和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也都对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实努力进行了报道。[2]

国际体系将按照一种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方式持续演进。但似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再变得简单。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双边联系的紧密性在

1 Leon Gettler, “Carbon Can't be Stored in Limbo, But That's Where the Major Parties Want it,” *The Age*, August 4, 2010.

2 Adam Morton, “Sorry State of Play When Chine Leaves Us for Dead on Climate Change,” *The Age*, August 18, 2010; John Garnaut, “China Gets Tough on Energy,” *The Age*, June 18, 2010.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再变得简单。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双边联系的紧密性在不断增长。

不断增长。应该强调的是，有关期待变化的政治并不是一个理性、连贯和公平的过程。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治现实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行为已成为澳大利亚政治党派之间日常辩论中的话题，这尤其反映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

同时，中国已成为世界舞台上更加重要的玩家，对中国的期待也变得更高了。或许笔者的看法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测的正相反。我认为，吊诡的是，当一个国家力量更强之时，对这个国家增强透明度的要求会变得更大，对这个国家用行动增进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要求也会不断增长，即便对于如何去做到这一点的争辩一直都会存在。

（凌岳　译；于铁军　校）